

移民网络与侨乡跨国移民分析 ——以青田人移民欧洲为例

刘莹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国际移民; 移民网络; 移民潮; 青田华侨; 侨乡调查

[摘要] 介绍了移民网络理论, 并运用移民网络理论分析了侨乡青田移民网络的形成、特点、演变、运作机制、发展趋势及其对移民潮的影响, 认为移民网络是青田移民的主要途径, 是侨乡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 也是侨乡移民潮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移民的发生、方向、过程和持续都是由移出地和移入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历史条件促成的, 当条件产生变化, 移民雪球滚动的速度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或加速, 或减速, 甚至停滞。

[中图分类号] D634. 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5162 (2009) 02 - 0027 - 09

Emigration Network and the Transnational Emigration Waves in Southern Zhejiang Qiaoxiang: A Study on the Emigration of Qingtian People to Europe

LIU Ying

(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migration network; emigration waves; overseas Chinese from Qingtian; fieldwork research in Qiaoxiang

Abstract: The theories of migration network are crucial in study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is article giv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migration network theories while examining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emigration network established in the Qingtian Qiaoxiang,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the local emigration wav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migration network is not only the major vehicle for the transnational outflow of local people, but is also part of the important social capital in Qiaoxiang, ensuring the continuation of emigration flow. The author concludes by emphasizing that the occurrence, direction, process and continuation of emigration are subject to, or regulated by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both societies of origin and target. When certain conditions change, the rolling speed of migration snow ball would also change accordingly, either speed up, or slow down, or even completely stop.

国际移民问题已经成为 20 世纪以来全球性的问题。为了解释国际移民现象, 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国际移民理论框架。随着移民网络的作用被当代国际移民学界日渐重视, 移民网络理论研究不断深入。这一理论解释了移民

动因消失后迁移仍持续的原因, 强调移民网络一旦达到一定规模就可以自我复制, 网络迅速扩张, 导致移民人口迅速增长, 从而引发移民潮。在中国侨乡, 社会资本主要构建于侨乡人与业已在外定居之亲友同乡之间的移民网络

[收稿日期] 2008-10-11; [修回日期] 2009-03-23

[作者简介] 刘莹, 女,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专门史专业 2006 级博士生。

中。浙江侨乡青田既是拥有悠久移民历史的老侨乡，又是新移民潮持续活跃的重点侨乡，已经成为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有不少研究成果相继问世，^[1]但是运用西方移民理论分析侨乡移民潮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多。青田县是浙江省乃至中国著名的侨乡，地处浙南山区，海外青田人几乎与县内居住人口持平，且主要集中在欧洲。那么，地处浙南山区的青田如何与遥远的欧洲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如何保持并发挥作用？本文重点运用移民网络理论，分析侨乡青田的国际移民现象，特别是移民网络的形成、演变及其对移民潮的影响。

一、移民网络理论

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三四十年，为了解释国际移民现象的复杂和多面性，来自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模型及分析框架，国际移民理论研究随着历史变迁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和趋势。西方学者的国际移民理论研究成果颇丰，相对而言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2]

国际人口迁移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学界普遍认为，近现代历史上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潮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重商主义时代的国际移民（1500 - 1800年），主要标志是欧洲殖民主义主导下的海外移民；第二阶段为工业化时代的国际移民（1800 - 1950年），主要标志仍是欧洲主导的海外移民；第三阶段为后工业化时代的移民（1960 - 1970年代末），标志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向发达国家迁移，移民输入国的数量和范围迅速扩大；第四阶段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1980年至今），而且仍在日益蓬勃发展中。^[3]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国际人口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跨境迁移，“21世纪是移民的世纪”成为国际移民学界的共识。

1885 - 1889年，美国学者埃内斯特·乔治·莱文斯坦（E. G. Ravenstein）发表了《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提出了移民的十一条“规律”，他指出：“诸如峻法酷律、苛捐杂税、恶劣的气候、糟糕的社会，以及强制行为的存在（如奴隶的买卖和贩运）等等，都

曾造成并引发人民的背井离乡，但这些移民在规模上远不如致富的本能引发的移民大潮。”^[4]他的研究开创了移民规律“一般性研究”的先河，莱文斯坦因此成为公认的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在此基础上，赫伯尔（R·Herberle）于1938年提出了著名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这一理论影响至深。此后，国际移民理论出现了大量新概念、模型和分析框架。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S. Massey）将国际移民理论分为解释移民原因和移民持续的理论方法两类。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迁移新经济学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试图解释移民的原因，而移民网络理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和移民系统理论则试图解释移民持续现象。

伴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工业国家经济衰退，劳工需求减少，移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大部分前往工业化国家的移民都是以家庭、朋友等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迁移。这一趋势反映了移民流向的成熟化，移民通过以家庭、朋友等社会关系链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保持国际迁移的持续。这些新趋势向旧有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继而国际移民理论有了更新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移民网络理论（Migration Network Theory），也称移民网络社会资本理论（Migration Network Social Capital Theory）。移民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的研究由来已久，而将移民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挂钩，将移民网络视为社会资本却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人口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S. Massey）及其合作者，他们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资本理论”基础上于1987年首先提出。移民网络是在原籍地或迁入地的迁移者、从前的移民和非移民之间基于亲友乡邻关系所建立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移民网络降低了迁移的风险和成本，提高了移民对回报的期望，从而增加了国际迁移的可能性。关系网络形成了一种易使人们获得海外雇佣机会的社会资本。一旦移民数量达到了一定规模，网络的扩张就降低了迁移的成本和风险，

迁移的机率提升，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迁移，这反过来进一步扩张了网络。^[5]在提出这一理论之后的二十年间，以道格拉斯·梅西为首的支持这一理论的学者们，一直在不断丰富完善移民网络理论，并运用它解释了大量的移民现象。移民网络理论作为一种人际结构，介于个人决策的微观层面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之间，不仅在理论上可以解释移民现象持续的原因，并且有助于预测未来移民的趋势。在当代国际移民理论研究中，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梅西及其同事们的研究解释了移民动因消失后迁移持续的原因，强调了移民网络的重要性并使理论体系化，凸显了社会网络对移民的深刻影响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跨国移民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已有部分学者尝试运用移民网络理论分析中国跨国移民现象。^[6]但用移民网络理论分析中国跨境迁移现象尚处于起步阶段，侨乡和海外华人日益制度化的跨国移民网络的形成，已经成为中国沿海侨乡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是中国沿海侨乡后续移民活动长盛不衰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一理论强调社会网络对人们移民行为的影响，符合中国社会注重人际关系的传统文化特点，符合中国当代国际移民现象的客观规律，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与探讨。

二、青田人移民网络的形成与演变

“青田石”与青田移民网络最初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青田县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华侨历史已有300多年，清初已有县人侨居国外。青田地处浙南山区，山多地少，地理条件恶劣，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中，青田人开采“青田石”并加以艺术性的再加工，形成特有的青田石雕文化，成为青田人最初出国的基本媒介。而青田跨国移民的风行又是得益于在海外“贩卖青田石致富”的传说。青田人普遍认为，青田石与青田人出国有密切渊源。

关于“青田石与青田人移民”的关系，李明欢教授的看法比较深入。她认为，重要的是剖析“青田石”之说在当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及其所产生的特殊社会功能。当人们在贫穷中渴望改变现状时，“贩销青田石”指给他们一条充满希望的致富道路；人们在“乐意”相信此说的社会氛围中，走向了遥远的欧洲。^[7]可以说，青田人用“青田石”铺出了跨国移民网络的起点，而移民网络是在早期移民潮中逐渐形成的。

早期青田移民潮的兴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国六年，北京国民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大批劳工赴欧洲参加战地服务。是年冬，青田县政府开展招募工作，凡报名者均被录取，共招募2000多人，战后大多定居欧洲，其中在法国就有1000多人。^[8]这2000名青田赴欧华工是一次出国的最大批量，使海外青田华侨人数急剧增大。早期陆续赴欧行销青田石的“图书客”与一战赴欧华工为青田人早期移民潮奠定了基础。继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青田人赴欧洲移民潮，约有2.5万青田华侨在这个时期生活在欧洲。^[9]青田早期移民潮基本上是以移民欧洲为主，青田华侨集中欧洲的格局也由此形成。

青田移民网络是在早期移民潮所构建的海外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早期的海外移民没有任何社会网络资源可以依赖或利用，凭借着冒险精神出国打拼。因此，他们的移民成本最高。一旦第一批移民在海外站稳了脚跟，后续的迁移行为便开始了。例如，青田方山乡龙现村、阜成乡周宅村，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大批人被带到海外，成为著名的华侨村。^[10]这与中国人浓厚的家族观念有关。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青田移民往往是亲带亲、故帮故，一个人出国了，全家相继移民海外；一个家庭出国后，又以同胞、同宗和联姻关系将另一个家庭成员进而整个家族带出国，形成了这个地区特有的移民网络，推动了移民潮的发展。

青田早期先锋移民依靠冒险精神为后续的移民打下了基础，家乡的潜在移民在先锋移民的帮助下陆续迁移，逐渐编织移民网络。移民网络是连接迁出地与迁入地的迁移者、从前的

移民和迁出地居民间的内在网络，这一网络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增加人们决定移民的概率。^[11]显然，移民网络在青田移民跨境迁移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并为移民潮的延续打下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青田的移民网络经历了几近断裂、逐渐恢复和重新活跃的不同阶段。其间，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青田人国际移民也经历了从低潮到逐渐兴起、迅速高涨的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大陆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出境管理规定，从法律上将出国的合法途径限制到最小。这一时期，无论是移居海外，还是回乡探亲，都出现人数少、规模小的现象，华侨与侨乡的联络几乎隔绝。这段时期，青田的移民网络几近断裂，但是青田移民海外的涓涓细流并没有完全停止。二战后，欧洲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随之好转，有利于华侨创业发展，早期移居欧洲的老华侨在艰辛创业中发展，已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但他们的事业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急需亲人继承、发展产业，但是却难以从位于中国大陆的家乡“带人出来”。老移民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能从家乡带来至亲，如荷兰的青田华侨以拥戴社会主义祖国者居多，因此，返乡时，他们即以“爱国华侨”的身份，争取家乡父母官对其身份认可，进而提出“父子团聚”，“事业发展需要帮手以便日后更好支持家乡建设”等合情合理的要求，使家乡有关部门对其网开一面。^[12]但是，随着出国审批制度日益严格，侨乡出国一度比其它地区更难。青田县1954年全县申请出国仅3人，但均被卡住不放；1955年申请者7人，批准3人；1956年申请有3人，全数放行。^[13]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移居青田县以外的青田人（包括归侨）申请出国，当地审批比青田明显宽松，出国容易得多。如余杭县（现杭州余杭区）闲林镇归侨农场，是旅欧青田归侨兴建的，1956年农场归侨申请再出国，全数获准，都返回意大利。建国后第一个悉数移居巴西的家庭是周继文的妻子、子孙们，也是从外地离开的。^[14]移民的过程也是千辛万苦，有的一等就是半年、一年，有的还要再转道第三地或第

三国。虽然出国面临着种种困难，但青田人依托亲缘紧密的移民网络，延续着移民之路。从1950年至1959年，全县批准出国152人，1960年至1965年，全县正式批准出国124人，1966年至1976年，批准出国91人。^[15]由于国内要获准出国不易，这段时期出国移民仅仅是少数人的个体行为，移民潮处于低谷。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移民网络逐渐恢复，兴起了新一轮的移民潮。随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西欧各国相继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大使级外交关系，在西欧的老华侨纷纷以“家庭团聚”为由，向所在国政府申请自己在中国家乡的亲人移民入境。青田申请及获准出国的人数就开始明显上升了。老华侨与家乡恢复了联系和互动，青田的跨国移民网络也得到了恢复。青田人如果想出国谋生，必然会找到同乡或同宗族在海外已立足的兄弟帮忙，而后者也认为有义务为对方提供从移居到谋生的支持。70年代后较早从侨乡出国者，几乎都在国外有“十分过硬”的亲缘关系，他们抵达移居地后都有人接待，有人帮忙安排食宿并直接提供或帮忙寻找工作机会，新来乍到者往往很快就可以进入打工赚钱的新生活。而新移民传回的信息，更令圈外人羡慕不已，在移民网络以外的人就会绞尽脑汁进入这个圈子。由于“侨眷”在获得出国护照及取得入境签证上都占有优势，因此，在青田就出现了有亲靠亲、无亲“找”亲之风。于是，人们通过传统的子女联姻、儿女过继“建立”起人为的亲缘纽带，跨国移民网络由此更新和扩张，吸引更多的新移民。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入境政策放宽，青田人移民网络重新活跃并走向成熟，出国人数激增，形成了青田移民海外的新高潮，并延续至今。据青田县2006年侨情调查数据显示，全县共有华侨华人146825人，其中华人31886人，归侨85人，侨眷118252人，分布在世界5大洲84个国家；另外，青田县侨联对温州市青田籍归侨侨眷联谊会、杭州市青田籍归侨侨眷联谊会以及丽水、上海、北京等地的青田华侨做大致统计，发现有5.4万名青田籍华侨以这些国内城市为主要联系地，他们

在国外参加的仍是青田同乡会，并一直自称为青田华侨，但是在青田本地已无法具体统计在内；再加上调查存在的漏报率、在国外的青田华侨二、三代以及整个家族以及旁系全部移居国外而无法调查的对象，所有这些人全部计算在内的话，青田县估计共有在外华侨 22.2 万人。^[16]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迄今出国的青田人为目前国外青田人的主体，新移民大都是与移入国老移民有某些联系的人，利用先辈在欧洲业已奠定的移民网络基础，以连锁迁移为途径，通过“家庭团聚”、“继承财产”、“餐馆劳工”等方式，大量移民海外。潜在移民与先前移民的联系构成了一个不断延伸的跨国移民网络，中国人的亲缘关系与宗亲观念是维系网络的纽带，社会网络在提供移民信息、就业机会、创业商机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有网络会促成新网络的产生，而迁移本身也不断促进社会网络的延伸，这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任何涉及移民的社会信息一旦进入网络内的信息圈，就会迅速传播。每一个已经出国的乡人都可能是新移民链的起点，由此如滚雪球般配带出一批后续的移民。这样的现象很普遍，以“郑氏家族侨谱”中郑氏家族的连锁移民为例。1936 年，郑氏家族的第一代郑严银先生，率次子和侄儿赴法国谋生，靠沿街叫卖糊口，生活极度困苦。历经几代人六十年漫长的艰苦奋斗，终于在事业上获得发展，具有一定的财力，家族出国人数也大为增多，如今已多达 153 人。^[17] 移民网络的扩大，为青田人在海外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与空间，这也是青田移民潮持续高涨的重要原因。

三、青田人移民网络的运作机制

在中国，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体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参与网络，如因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目前在中国农村 83.5% 的人是和亲属、朋友或同乡外出的。^[18] 可见，侨乡移民网络的形成是以既有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具体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已经存在并天然形成的；其二是这种关系原本是非功利性的，但是在移民过程中进行了工具性的使

用，诸如血缘关系的利用、姻亲关系的利用、同乡与同学关系的利用等。梁漱溟在谈到中国社会的“本位”问题时提出，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关系本位。^[19] 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模式，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本位“以己为中心，像石头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是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0] 中国的社会结构特点即是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尤其是在农村，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差序格局”为表现形式，家庭、家族、亲属等初级关系作用明显，而以职业、共同兴趣和其他共同经历为基础建立的次级关系在人们生活中表现出的作用次之。

家族宗族、亲属关系、邻里等社会关系构成了侨乡移民网络的基础。家庭单位是移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和家庭都是家庭单位的代表元素。家庭单位是支持单位，他们有自己的结构特征，即移民的倾向和模式。一些研究表明，移民的动机、能力、模式受到家族的资源水平、年龄、性别结构以及家庭生活周期的影响。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比贫穷家庭更容易移民，成熟男性多的家庭也更容易移民。家庭单位是依靠家庭和家族社会网络建立移民社会化的基础。家族和家庭中一人出国后一旦安稳，有责任将其他成员带出国，而其他成员也对出国移民有着明确的期望，移民目的和方式都很明确。^[21] 青田人的移民网络也不例外。青田人出国大都是一人先行，站稳脚跟、略有积蓄后，再将家庭成员一一带走，继之带走“九族”中的人，这样若干代之后就在海外形成数十至数百人的大家庭。如青田的陈氏侨居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人数有 200 余人。还有法国的郑氏、周氏家族等，人数都很可观。仅在巴西的青田籍华侨中，就有项氏、孙氏、季氏、伍氏和吴氏等五个主要的大家族。前面四个家族主要分布在里约热内卢，吴氏家族则主要集中在圣保罗。每个家族大约都拥有 40 至 100 多人，若把外戚计算在内，人数可达百人至数百人。^[22]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注重血缘的特性，

个体不能只为自己活着，还要为自己的家庭、家族负责。所以一个人先出去稍能立足后，就会尽其所能，先把自己的直系亲属带出去，接着就是旁系亲属。而这些亲属出国后，又会重复这种模式，把自己周围的人携带出去。如此反复，从而编织成大小不一的移民网络。

青田华侨的出国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上文提及的家庭成员、亲戚之间的相互帮助，即所谓的“亲带亲”。这种模式通常包括两个步骤：合全家乃至全家族之力，筹出一笔资金资助一人先行出国；先行出国者在国外立足后，便要努力工作、省吃俭用，以尽快积累资金，资助其他亲人出国。二是乡亲父老之间的相互帮助，即所谓的“邻带邻”，也是一种常见的出国模式，它多以提供信息的形式出现。就效果而言，“邻带邻”更有助于形成规模效应。移民网络是移出地社会群体在跨国社会空间的有机组成，“同乡”代表移民来自同一移出地，也是移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移民网络为侨乡人移民海外提供了完善的支援体系。第一，信息传递。侨乡人利用跨国移民网络传递的信息，触发他们移民的动机，获得老移民出国的路径，大大提高了移民海外的可能性；第二，解决资本问题。移民网络能够通过亲对亲、邻帮邻等形式为他们提供出国机票，解决食宿问题，甚至帮助他们安置工作；第三，网络能够帮助刚来的人尽快适应新环境，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帮助解决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不适应等问题；第四，网络还向出国者传授有关的经验、技能，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第五，在发生意外事件与安全方面，网络也会为成员提供保护，如同乡之间在生病时互相照顾。正是基于此，青田人拥有其它非侨乡地区居民所无法比拟的国际迁移优势，如青田县阜山乡有6000多人移民海外，分布在西班牙、意大利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乡里有6462人是侨眷，70%的家庭都有直系亲属在国外。^[23] 侨乡丰富的移民网络资源意味着成熟的移民网络可以使他们相对轻松地选择出国或者留守。移民网络提供的支援体系，使青田人有机会选择最安全妥当的移民路径。

在移民网络中，人们相互之间形成的义务

与期望构成有效的社会资本，对于移民行为的延续至关重要。新移民在先前移民的帮助下，相对容易地来到国外，并且能够很快融入在欧洲的亲友乡邻组成的社会网络中。先前移民帮助侨乡人移民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1998年，自家乡青田的亲戚朋友十多人前来投靠旅奥地利华侨陈仁光先生，他们迫切需要的是“办居留”。而此时奥地利移民政策很紧，办居留无望。当听到希腊开放大赦移民的消息后，他当机立断，借了13本奥地利籍青田人的护照，起程到希腊开办大型股份公司，以劳工之名把这群投靠的亲戚朋友携到希腊办居留，获正式身份。^[24] 在移民网络中蕴含着先锋移民对迁移者有支持帮助其移民的义务，这种义务存在于亲友间，也存在于朋友、同学、乡里间，这种网络中的义务超越了国界，促进了链式移民，使侨乡和移出地社会间的迁移行为经常化，移民网络也随之不断复制，移民潮也因此绵延不绝。

侨乡与移民的互动联络保持了移民网络的活跃度，有助于移民潮的延续。李明欢教授认为，侨乡实际上就是移民网络的地方载体，在这里，移民信息、移民纽带在多层面上交相运作，形成连锁效应。^[25] 青田移民网络能够保持如此持久的活力就是依靠侨乡人与海外不断的联系与互动。西方学者很早就在移民研究中提及，在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社会网络中，家庭和个人网络主要是靠汇款、礼物和通信相互联系，当然也包括移民返乡时网络成员见面交流（这种交流通常能很有效地传递移居地信息），网络成员间的沟通与联络也影响着移民进程。^[26] 电话联络、家乡走访、海外汇款和送礼品等方式都是海外移民与侨乡联系的主要方式。在青田侨乡，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人从国外回来，特别是春节，华侨有返回家乡过年的习惯。据青田县侨办的同志介绍，每逢春节青田县的酒店饭店客人应接不暇，年夜饭的预订也是相当火爆。^[27]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移民整体素质的不断提升，利用国际互联网发邮件、网上聊天、开博客已经成为常见的互动方式。笔者在青田调查时认识的青田籍姑娘小包，去年与一位巴西华侨同乡结婚

后远赴圣保罗，她通过 QQ 和家乡的亲友保持联络，并开辟了个人主页空间，随时将异国的经历和感悟与大家分享。

侨乡人通过移民网络得到圈外人无法获得的移民方面的有效资源，通过跨国移民网络的途径而实现侨乡人口流动。移民网络不是一种静态关系，仅仅是亲友们向迁移者提供信息、资源和帮助，而可以看作是动态关系，通过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持续互动，侨乡和移入地之间亲朋好友社会关系链联结而成的移民网络，可以给侨乡与移民提供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结构。移民网络在持续的互动和延续中愈发强大、稳定，这种移民网络社会资本对于移民潮延续起着重要作用。

四、青田人移民网络的发展趋势

移民网络提高了雇佣和获得可靠收入的可能，增强了潜在移民群体的移民期望，这种期望导致更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因此也增加了移民人口。^[28] 移民网络理论试图解释国际迁移持续的原因，作为侨乡青田大规模移民潮的结果是形成并扩大了移民网络，但是移民网络的发展趋势如何？移民雪球是否会永远滚下去？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因为移民网络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家庭与移民发生联系，移民信息通过网络传递到整个侨乡社会，这是青田侨乡的一大特点。在移民网络中有迁移经验的人比没有的人更容易再次移民，在海外有亲友乡邻关系并且有往来的人更容易移民。^[29] 在青田传统的侨乡社会，以前，男性有更多的移民机会，现在女性移民比例大幅增加，有的家庭是夫妻一起或先后移民海外，有的是跟随父母移民海外，还有通过与移民家庭联姻的方式移民海外。高移民率现象长期存在，大家都有移民意识，人们已经把移民海外看作是生活的一部分。移民对于年轻人是一种惯例，如果没有尝试的意识，就会被大家认为是懒惰和不思进取，移民通常被认为是家庭的经济需要和个人环境改善的途径。通过对青田县中学学生的调查发现，学生由于从小受到家族中有海外移民的影响，出国期望很强烈。因为出国已经成为谋生的好出路，学生们

一心想着有机会就出国，普遍不重视学习，除了外语。而侨汇可以保障侨乡家庭的基本生活，并且有改善生活条件的可能。当移民收入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积累的投资资本，使整个家庭有机会提高经济生产力。移民在海外接触到更高水平的生活方式，有了积蓄后便有能力仿效，从而影响了侨乡的生活方式，侨乡家庭通过仿效加大生活用品的支出增加了消费能力。而非移民家庭看到亲戚、朋友和邻居通过移民改变了社会经济条件，生活的关注点便集中到海外移民的发展机会中，他们积极与移民家庭联络，以期进入移民网络。

随着侨乡移民网络的系统化（帮助解决路费、住宿、工作，帮助学习适应新环境，准备法律文件，非法移民避免被捕和遣返），移民的人越来越多。伴随每个新移民，连接潜在移民与先前移民网络关系的扩张，移民社会资本累积，更多的人能利用这些资源提高移民的可能性。因为个人移民的增加，网络链越发扩张，累积更多的网络社会资本。而移民网络的扩张，迁移的成本和风险降低，迁移已经变得制度化，移民潮开始忽略两地的工资差异、移入地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更多的关注侨乡社会的移民需求，移民雪球越滚越大，不仅移民数量，而且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数量也在增加。这种反馈机理意味着移民社会资本对迁移的作用最终超过其他社会经济因素。近几年青田县新移民增长迅速现象也体现了上述特征。据 2006 年青田县针对 146825 位华侨情况的调查显示，1990 年以后出国的华侨有 102610 人，占华侨华人总人数的 70%，且以青壮年为主。1978 年以前出去的老华侨仅有 6186 人。青田华侨分布 5 大洲 84 个国家，96% 集中在欧洲，有 141014 人。华侨居住最多的国家是西班牙，有 55867 人，占总数的 38%；其次是意大利，有 44150 人，占总数的 30%，这两个国家的青田华侨占了在海外华侨总人数的 68%。^[30] 一个青田县有如此多的人移民海外，移入地高度集中，充分说明了移民雪球的效应。

当移民网络漫延到侨乡所有人都认为可以很容易迁移时，移民开始减速，侨乡移民网络的饱和点出现了。在青田的一些村落里，由于

移民活动持续活跃了 20 余年，村里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笔者在青田县方山乡对归侨裘守中老人（其子裘伯平时任荷兰青田同乡会会长）访谈，裘老先生是乡侨联会老会长，已经八十多岁了，1977 年至 1985 年在荷兰打工，期间四个孩子相继移民，现在老夫妇俩在村里安度晚年，平时和儿女保持电话联络。^[31]类似裘家这样的空巢家庭在老侨乡相当普遍。可见，移民潮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从村镇这一层级看，老侨乡的移民网络趋于饱和，移民雪球逐渐滚不动了。当然，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一些移民潮刚刚启动的新侨乡，移民网络还处在扩张状态。

从移入地来看，移民呈现出流动性而非定居性的特点。在移民网络中，圈内人几乎很少与陌生人接触与合作，新移民跟随网络内既定的生活方式和职业模式生存。当传统移入地的移民数量急增，工作或商机趋于饱和，生活成本增高，青田移民便呈现移入地分散的特点。班国瑞（Gregor Benton）和彭轲（Frank N. Pieke）教授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在欧洲的华人自愿地把自己局限在移民网络内，新老移民都很少在圈子经济环境以外寻找机会，当圈子内的经济环境出现饱和，他们便迁移到存有商机的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链式网络移民，可以把社会网络复制到任何一个角落。^[32]尤其是青田、温州人，他们有着灵活的头脑、勇于创新开拓的冒险精神，哪里有生存空间就去哪里。例如，90 年代初期是中国人移民匈牙利的高峰期，这些移民大部分是温州人和青田人，他们看到匈牙利当时的商机蜂拥而来。^[33]当匈牙利经济不景气后，他们又迅速向南欧迁移，寻找新的机会。这一现象体现了移入地的移民网络呈现移入、饱和、分散的规律。

侨乡的移民网络有一定的封闭性，通常是在圈内复制扩张。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青田作为乡土社会，同时也是侨乡社会，社会网络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具有侨乡特色的移民网络社会资本存量。乡土社会重视以家庭为纽带的亲缘、地缘关系，重视人际关系，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家庭和家族派生出来的，主要

靠家族、同乡维系的传统社会资本。乡土社会对圈外人会有一种天生排斥，相对封闭，这些都影响着侨乡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成为一种“习性”，并有很强的惯性，所以，即使是同一个区域，没有移民资源的地区通常被排斥在圈外，移民信息被隔断，很难引发移民潮。可见，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非常明显。

移民网络传递并形成个人、家庭、家族在侨乡与移入地社会结构中的影响，并且传递移入地的信息和有助于在当地生活的资源。所以，移民网络早已成为侨乡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移民网络是侨乡移民潮得以延续的最重要原因。侨乡青田的移民网络经过早期移民潮、新移民潮的历程，移民网络日趋成熟，一些区域呈现临界饱和，一些区域方兴未艾，移民雪球不会在同一区域无止境地滚动，因为人口迁移不仅是个人的决定，也不仅仅是考虑经济、政治因素的结果，而是所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移民的发生、移民的方向、移民的过程和持续都是由移出地和移入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历史条件促成的，而这此结构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影响到个人和家庭，当结构产生变化，移民雪球滚动的速度自然会发生变化，或加速，或减速，甚至停滞。

[注释]

- [1] 如张秀明：《青田人出国的历史与现状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张秀明：《改革开放以来青田人的跨国迁移活动及海外青田人对青田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05 年第 3 期；周望森：《青田石雕与青田华侨——论青田华侨的起源问题》，《华侨华人研究论丛》第 2 辑 1997 年；周望森：《青田华侨史稿》（未刊本），青田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编印 2005；等等。
- [2] 相关代表研究包括：李明欢：《20 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年第 4 期；赵敏：《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评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 年第 4 期；张晓青：《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述评》，《人口学刊》2001 年第 3 期；等等。
- [3] Douglas S. Massey, “Why Does Immigration Occur?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in Charles Hirschman, Philip Kasinitz and Josh DeWind eds., *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p. 34.
- [4] 廖正宏:《人口迁移》,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第100-109页。
- [5] Douglas S. Massey, Felipe García Espinosa, Jorge Durand and Humberto González, *Return to Aztlan: The Soci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Mexi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237.
- [6] 如: Gregor Benton and Frank N. Pieke, *The Chinese i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8; Frank N. Pieke, Pál Nyíri, Mette Thunø, and Antonella Ceccagno, *Transnational Chinese: 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2004;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李明欢:《“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王春光:《移民的行动抉择与网络依赖——对温州侨乡现象的社会学透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王维、钱江:《移民网络、社会资源配置与中国东北新移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等等。
- [7] 李明欢:《“相对失落”和“连锁效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第86页。
- [8] [15] 陈慕榕主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2、643页。
- [9] 陈里特:《青田人出国到欧洲经过》,《青田文史资料》第六辑1995年,第5页。
- [10] 周望森、陈孟林:《青田华侨史稿》(未刊本),青田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编印,2005年1月,第12页。
- [11] Douglas S. Massey et al. “Theory and Rea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 186.
- [12] [25]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434、541页。
- [13] [14] 周望森、陈孟林:《青田华侨史稿》,第43页。
- [16] [30] 周峰:《青田县侨情调查分析报告》,《大青田周刊》2006年9月5日。
- [17] 温州市华侨华人研究所编:《郑氏家族侨谱》,1995年印制,第5页。
- [18] 卜长莉:《社会关系网络是当代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途径和支撑》,《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66页。
- [19]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 [20]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 [21] Monica Boyd, “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3, No. 3, Special Silver Anniversary Issu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 Assessment for the 90's, 1989, p. 642.
- [22] 黄昆章、张应龙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侨乡的现代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第320页。
- [23] 《青田侨报》2007年8月10日,第2版。
- [24] 陈仁光:《仁之光——记希腊青田同乡会会长陈仁光先生》,中国青田网, <http://www.zgqt.zj.cn>, 2009-03-03。
- [26] James T. Fawcett, “Networks, Linkages, and Migration System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3, No. 3, Special Silver Anniversary Issu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 Assessment for the 90's, Autumn, 1989, p. 675.
- [27] 笔者2007年8月27日侨乡调查笔记。
- [28] B. Davis, G. Stecklov and Winter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Rural Mexico: Disaggregating the Effects of Network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Population Studies*, 56 (3): 291 - 309, 2002, p. 431.
- [29]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3, Sep. 1993, p. 460.
- [31] 笔者田野调查工作笔记,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2007年9月4日。
- [32] Gregor Benton and Frank N. Pieke, *The Chinese i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8, p. 11.
- [33] Pal Nyíri,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Europe—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Hungary*,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9, p. 32.